

## 导 言

本研究建构在实证上，这些实证主要取自原始材料及引证日本和中国的学术成果，把长期受忽视或大量遗忘的事实第一次集中起来。这些事实表明了令人吃惊的情况，并要求按如下线索，对中国近代革命的分析架构作根本性的修正。

粉碎了经历 2100 年中国帝制政府模式及其哲学基础的，不是以孙中山（1866—1925）及其同伴为中心的 1911 年政治革命 相反地却是 1901 至 1910 年以晚清政府新政为中心的和体制的革命<sup>①</sup>。按本书分析，1911 年革命的主要意义，是保证了新政年代思想和体制改革继续存在——既不后撤，也不走回头路。同时 新政革命及其成就自 1911 年后一直成为实际的基石，虽然不受承认也没有公开宣告。结束帝制后的中国，正是在这基石上决定思想和体制的方针，以至今时今日。

如果以人们更为熟悉的方式表述，那就是中国仅仅在 12 年内——从 1898 年百日维新的“失败”到 1911 年革命的“失败”——经历了根本性的转变。按本书研究 1898 年与其说是失败，毋宁说是中国经受世纪之交的转变、“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第一大步<sup>②</sup>。

在不少重要方面，保守的改革都努力取得了成就。1899至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后，慈禧太后（1835—1908）不得不下定决心，发起并推动了彻底的新政改革。从朝廷到各省，一批官员把改革推向前进，他们主要有张之洞（1837—1909），袁世凯（1859—1916），庆亲王奕劻（1838—1917），张百熙（1847—1907），赵尔巽（1844—1927），端方（1861—1911），岑春煊（1861—1933）和沈家本（1840—1913）等<sup>③</sup>。这些重要的和其他成千上万次要人物的事业和成就，为结束帝制后的中国，以至今日奠定了基础。为了强调其影响超越1911年，本研究至1912年止<sup>④</sup>。

新政革命主要有思想和体制两方面，如果不以日本明治为参照，对两者都难于理解。事实上，日本是作任何分析的关键。如果没有日本在各种各样的幌子下、在不同的层次表示合作，中国不可能打破传统控制而向现代道路迈进。中国思想和体制转变得如此顺利快速，甚而超过日本明治维新的进程。日本所扮演的角色、中国对日本模式和对个别人士令人惊奇的信心，将在第一、二、三章逐一解释。

理解近代中国在学术上的主要障碍，是对革命的定义规限得太狭窄，这蒙蔽了学者们的眼睛，难于理解延续最长的中国近代革命、静悄悄的新政思想和体制革命。1500年以来的世界史不断地提醒人们，革命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大多是非暴力的、不流血的。正如汤玛斯·库恩（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中指出，革命可能悄悄地进行，令人感觉不到，从农业、商业、经济革命扩展到思想、科学、技术革命，以至政治、社会甚而性革命。就中国而论，晚清时期不仅有推翻政府的政治革命，而且有更具深远影响的思想 and 体制的转变。把清王朝的最后十年，从有关1911年革命的因循思想中解脱出来，从那些对革命粉饰之言中解脱出来，对中国帝制后期的和帝制结束以后的真正革命转变，便较为容易理解了。

1911年后，置身舞台中央的激进分子和革命者改写了历史，籍清王朝突然崩溃而索取荣誉。他们，无论是清朝的对立者或充其量只是沾了点边的人，对晚清改革既无认识也并不感兴趣。真实的历史纪录还未来得及详细查证或整理前，中国已陷入 1916 至 1928 年狂暴的军阀混战。由于混乱被弄得稀里糊涂，由于清王朝在人们记忆中迅速消失，因而极少有人能清楚地看到，中国军阀和晚清的创新改革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军阀混战的十年中，孙中山于 1925 年逝世。他至死仍忠于他的信念，要摆脱军阀和帝国主义，鼓励人们支持他的事业。他生前是“受挫折的爱国者”死时仍是受挫折的爱国者<sup>⑤</sup>。

孙的逝世，促使人们更热切地寻求困惑了孙一生的答案：如何填补结束帝制后在精神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绝望的真空。那些早期的亲密伙伴如汪精卫（1883—1944）胡汉民（1879—1936）和蒋介石（1887—1975）等<sup>⑥</sup>他们宣传孙只是把孙看作团结全国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独一无二的有效的象征；更重要的是把孙视为基础，他们在此基础上为自己的政治前途和成为正统而下赌注<sup>⑦</sup>。到了本世纪 20 年代末期孙因 1911 年革命获得哀荣被尊为“国父”以至把那次革命也变成“孙的 1911 年革命”。这观点成了中国的信条。

在因循袭旧的历史上那些站在“孙的 1911 年革命”之外的人们，总被视为革命的对立面或敌人。头号敌人是袁世凯，他是新政改革的骨干人物，1912—1916 年的民国总统。他没有大吹大擂，却在结束帝制后的中国继续进行改革。在 1915 至 1916 年他企图建立君主制而没有成功，这就注定了他要贴上民国叛徒的标签；由于他和新政改革关系密切，那些改革和改革支持者们也成了协同犯而埋进坟墓。至于日本，它在新政期间所起的核心作用完全被遗忘了。在那 1915 年不光彩的 21 条要求后，任何回忆都只能起相反的作用，遭受批驳。

在历史上有过重大成就、使人惊叹的中国新政变革，就这样被遗忘了。教科书和专题著作，都没有把清朝革命性的转变，看作从 1898 年传统的中国政治形态，到 1911—1912 年近代的、调合日本—西方—中国的政治形态的飞跃<sup>③</sup>。新的政治形态尽管有缺陷和实施时摇摆不定，它终究是应时而生。事实上，我们所认识的今日（而且在可以预见未来的）中国，正是完全以新政年代思想和体制为基础。离开新政革命，20 世纪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本书第四章以后逐章为日本参与新政革命提供证据。本研究仅仅是个开端。差不多每一章都需要单独的专著加以发挥。希望这一研究能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 注 释

“新政”一词是 19 世纪 80 年代时的中国赴日考察者们，用以表述明治维新时期的各种改革措施的。例如，1887 年底，顾厚琨奉派游历日本，经半年考察“遍观学校、商务、军制、制造业诸新政”于 1888 年编成《日本新政考》一书。引文见王晓秋著《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 197 页。“新政”一词又累见于其他著作的书目，如《新政丛书》（上海 1897）及何启、胡礼坦撰《新政真铨》（上海，1901）。按韩国历史学家闵斗基的研究成果，1895 年时“新政”一词表述“新的政策”在 1898 年则表述“新的制度”或“体制改革”。见闵斗基著《国家政治形态和地方势力：中国末代王朝的改革》（Min Tu-ki, *National Polity and Local Pow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ss.: 1989) pp. 120, 125)。

在本研究中“新政”表述“新的政治体制”。发起新政改革的 1901 年 1 月 29 日的上谕中并未出现“新政”一词，但重心集中在社会生活中“新的政治体制”，明确地要查核“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引自《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总 4601 页。又见本书附录）。新政改革也确在教育、军事、警务及监狱、法律、司法方面成功地建立了“新的体制”。从上谕提出的目标以及上谕颁布以后的成就看，“新的政治体制”、

即“新政”一词概括了清末十年间的改革情况。因此本研究把 1901 年 1 月 29 日的上谕称为“新政改革上谕”。

我使用这些词语时是这样考虑的：“传统”指的是过去的整体，它不断变化而复杂，却总是中国特有的。它肯定中国过去一系列的经验，包容了国家和社会、现在及将来一切问题的答案。“现代”指的是新的思想状态——从回顾过去以寻求指引，到采取开放的调查研究态度对待一切，包括对中国以外的事物，藉以在敌意的世界中谋求生存策略。中国传统不是静态的、单一的，而是动态的和多向的，正如它的现代也是动态的和多向的一样。这些概念不但对新政年代明显地富有深意，也适用于本杰明·施瓦茨在《“传统与现代的对垒”，作为解释范畴的界限：中国知识分子的案例》一书中提出的问题（Benjamin I. Schwartz, “The Limits of ‘Tradition versus Modernity’ as Categories of Explanation: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Daedalus* 101.2:71-88 (Spring, 1972)）。“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一语，读者可能从柯文的重要著作《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中国晚清的改革》已经熟悉了（Paul A.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书中的这些概念，是用以探讨先行者王韞（1828—1897 年）的事业的。

关于张之洞，参阅苏云峰著《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台北，1976 年）及丹尼尔·贝斯著《中国进入 20 世纪：张之洞与新时代的产生，1895—1909 年》（Daniel H. Bays, *China Enters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ang Chih-tung and the Issues of a New Age, 1895-1909* (Ann Arbor, 1978)）。关于袁世凯参阅侯宜杰著《袁世凯评传》（郑州，1986 年）渡边惇著《清末袁世凯与北洋新政 北洋派的形成》特别是史提芬·麦克金朗著《中国最后王朝的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京津》（Stephen R. MacKinnon, *Power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Yuan Shi-kai in Beijing and Tianjin, 1901—1908* (Berkeley, 1980)）。关于赵尔巽，参阅罗杰·汤普森的两篇著作，《未来的幻想，当时的现实：地方行政改革，选举的策略，及辛亥革命前夕的中国传统社会》和《管理能力与自治政府：中国末代王朝和社会竞争的幻梦》（Roger Thompson, “Visions of the Future, Realities of the Day: Local Administrative Reform, Electoral Politic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on the Eve of the 1911 Revolution” (Ph. 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1985); and “Statecraft and Self-Government: Competing Visions of Community and Stat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odern China* 14.2:188-221 (April, 1988)。有关沈家本, 参阅岛田正郎著《清末中国对近代法典的编纂: 东洋法史论集》第三辑。

新的政府体制延续到 1911 年后的民国时期, 已为一系列重要研究所确认, 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 1860—1916 年》。然而该书的时间架构虽是 1860—1916 年 却对延续到 1916 年的问题, 没有就任何省或地区作单独的或系统的研究。

见马丁·威尔伯著: 《孙逸仙: 受挫折的爱国者》(C. Martin Wilbur, *Sun Yat-sen: Frustrated Patrio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 ⑥ 1988 年韩国出版了由闵斗基编写的专著, 研究了孙的六名主要伙伴, 把孙神化的主要人物——胡汉民, 蒋介石, 廖仲恺 (1878—1925), 戴季陶 (1891—1949 年) 陈公博 (1892—1946 年), 及甘乃光 (1897—1956 年)。闵斗基为这著作写的导言已译为日文: “Chūgoku kokumin kakumei no rikai no hōkō”, *Chikaki ni arite* 16:63-86 (November, 1989)。
- ⑦ 中国的政治文化是高度个人化, 似乎需要一个放大了的人物或象征, 把信奉的人们团结在他的周围, 并组成特别的关系网络, 才能工作。日本的政治文化是高度制度化和非个人化, 总是围绕着已经建立起来的机构和等级制度运作, 中国式的“个人崇拜”差不多是不存在的。由于这种差别的影响, 博闻广见的美国人, 今天都知道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但有多少同样博闻广见的人们, 能说出或知道一个日本明治年代的领袖, 或者说得出现在日本首相的姓名呢?
- ⑧ 兰保·沃雷著《中国现代化的道路: 从 1800 年到现在的历史回顾》一书 (Ranbir Vohra, *China's Path in Modernization: A Historical Review from 1800 to the Present*, 2nd ed.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1992)), 方向正确, 备受欢迎。沃雷指出, “王朝的改革计划包括五方面: 军事, 教育, 行政管理, 国家宪法及法律。一切进程都是带根本性的和严肃认真的。在军事、教育及宪法方面所取得的实质性进步, 改变了中国未来社会及政治形态的性质 (第 95 页)。

## 第一章 “黄金十年” 新政革命？

中国在 1898 至 1910 这 12 年间思想和体制的转化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整个过程中，如果没有日本在每一步都作为中国的样本和积极参与者，这些成就便无从取得。和惯常的想法相反，日本在中国现代化中，扮演了持久的、建设性而非侵略的角色。不管怎样从 1898 至 1907 年，中日关系是如此富有成效和相对地和谐，堪称“黄金十年”<sup>①</sup>。这黄金十年的关系，一再证明了对中国新政改革的成功具有何等作用。本章以回顾这一概念开始，于第二、三章详述日本扮演的角色及其背景进一步为“黄金十年”提供确证。

中国的新政改革的结果很不平衡，也的确带着缺陷，但多方面同时举行、迅速而不动声色的改革，彻底地永远粉碎了中国 2000 多年的帝制历史，把中国置于延至今日的帝制后的过程。对中国而言，成效是革命性的或者可称之为“新政革命”。本章的第二部分将检核“新政革命”这一概念。

### “黄金十年”？

表面看来，“黄金十年”的概念似乎不可理喻。在

惨痛的中日战争和签订马关条约之后不久，中日双方似乎不可能有密切的关系。这概念与一切逻辑都背道而驰，而这些逻辑又已深深地植根于中日人民心中。在中国人民中，它触发起 1937—1945 年日本野蛮地反对中国全面战争的焦灼回忆；在日本人民中，则触发起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那次嚣张至甚战争中的犯罪感时至今日，中日学者仍未能从这些往事中摆脱出来。

某种怀疑主义当然是必要的。例如，从 1868 年日本明治维新到 1945 年日本投降的整段时间内，完全可以毫不犹疑地视之为日本从未间断地对 中国和中国周边侵略的时期。在 19 世纪末期从 1874 年开始，日中之间的军事对抗规律地十年一次：1874 年日本对台湾惩罚性的远征；1884 年，中日军队在朝鲜冲突；1894 至 1895 年，日中爆发全面战争。

到了这个世纪，冲突的步伐加快了，日本每五年左右便挑动一次军事行动：1900 年，日本参加反义和团的八国联军，及由于日本的阻拦造成厦门事件惨败\*；1904 至 1905 年日俄战争，日本取得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特权；1910 年日本完全吞并朝鲜；1914—1915 年，日本军队接收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和特权，和德国在太平洋的领土；1918—1922 年，日本远征西伯利亚；1927—1928 年，日本在山东武装干涉，反对中国北伐军；1931 年满洲事件；1932 年日本军队攻击上海；1933—1937 年，日本在华北发动一连串军事行动 导致 1937—1945 年全面战争 为时长达八年 毁灭性

\* 译者注：指义和团运动期间，兴中会准备武装起义，日本企图乘机占福建，答允供给武器。1900 年 10 月初，兴中会在惠州起义，起义军曾发展到 2 万人。这时八国联军已入北京，列强相互牵制，日本感到不可能割取中国领土，对革命党在台活动又有戒心，遂改变主意，不但不供给兴中会军械，并禁止其在台活动，起义军弹尽粮绝而失败。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四册（1962 年版）第 144 页。

的战争遍及全中国，在战争中牺牲者数以百万计<sup>②</sup>。

然而即使在日本侵略扩张的 30 年代，仍有个别人回忆现代中日关系较为美好的时光，1936 年，研究中国学者神崎清在《支那》月刊作了相当详细的描述，他写道：

“日本在义和团事件中参加了八国联军，使日本在中国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得以提高，它在处理军事和国际关系方面的公正态度，赢得了中国人的信任。日本主要通过军事、警务和教育方面的领导，直接参与了清政府的改革，扩展了新的日支关系。清政府正想方设法避免西方侵略，日本政府也正千方百计遏制西方的渗透。在日俄战争前后，围绕着这一共同利益，出现了日本人称之为对支外交的黄金时代。”

1943 年，实藤惠秀把 1896 至 1905 年间称为中国“纯粹的亲日时代”<sup>④</sup>。而在四年前，1939 年实藤就写道：“只要注意现代时期，特别是日清战争后到日俄战争之间的年份，是无比的日、中两国的亲和时代。关系密切得使其他外国人妒忌。”<sup>⑤</sup>

他最后一句说得绝不夸张，那是事实，在 20 世纪初期西方刊物中就说得非常明显。例如早在 1901 年 7 月在上海敏感的潘慎文牧师 (Rev. A. P. Parker) 在题为《日本对中国新的侵略》一文中就提出：

“思想的侵略取代武器的侵略，教育的宣传取代压迫。狡猾地企图以思想力量多于物质力量以征服中国。

“简言之，这就是在日本人的程序下，现正迅速地摆到中国面前的事态，在过去短短几年中，日本人的行径已经充分表明了<sup>⑥</sup>。”

潘慎文的文章特别注意为日本学生在上海（于 1901 年 5 月

\*译者注：据 1995 年 5 月 10 日《人民日报》“中国军民伤亡三千五百多万人”。

底开设的东亚同文书院后升格为大学)开业典礼,报导了中国官员发表的热情洋溢的欢迎词,预期书院对中国长远的价值是“反抗白种人对东亚统治的重要支持<sup>⑦</sup>”。东亚同文书院的确发展为出色的学院,不过从根本上说,日本的得益是远远超过中国的<sup>⑧</sup>。

西方的嫉妒和焦虑,在乔治·林奇(George Lynch)《中国的日本化》一文中表露无遗<sup>⑨</sup>。无独有偶,雷里·宾茹(Rene Piñon)也写了《中国的日本化》,文章宣称“这个新的中国将是日本人的中国”他继而解释道:

“在日本影响下(中国)已决定进行改革并付诸实施(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有关‘大清国之教育改组’的报告……是直接受日本体系启发的……宣布除外语教员外,全部教员都应在日本选聘。事实上,最近成立的师范学堂,所有外籍教师都是日本天皇的臣民……不用说,这些日本人的教育使命必定产生巨大的影响<sup>⑩</sup>。”

上海德国总领事 1905 年的秘密报告,同样感到忧心忡忡:

“除了日本商业和工业的发展足以令人吃惊外,我仅指出两方面以提高我们的警觉:第一,日本以庞大的国库补助,促进海运繁荣,保护并奖励贸易扩张;第二,通过东亚同文会等机构,热心发展中国教育,同时通过开办上海东亚同文书院,锐意培养能在中国活动的自己人。为了对抗这一切,德国政府必须提供大量补助,积极保护航海,并在扬子江地区,尝试大规模设立培养华人的学校,放手传教<sup>⑪</sup>。”

再引述一段,就足以代表消息灵通的西方舆论对当时日本在中国的看法。与清廷联系密切的著名的英国新教徒、教育学家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于 1906 年著文称:

“然而,北京可能注视着东京,很明显,日本对中国 18 省的影响在不断地扩大,日本的旅游者、商人、教员、军事教官,在帝国无远弗至。中国贵族和统治阶级成千上万的子孙在日

本受教育，回国后按在日本所学，依样画瓢。中国本地最好的报纸是日本人控制的，而本地报业蓬勃发展，本身就最具革命现象的意义……我们希望日本影响的扩张不会令人猛然一惊，相信日本真正的政策不是要强迫中国成为西方文化或思想的虚伪模仿者，而是使用西方的配件，以保存东方生活和政体的根基<sup>⑫</sup>。

在这种西方通常是传教士的评论的背后表明了西方（首先是与传教有关的）对中国改革影响迅速减弱的严重关注。在 1895 至 1898 年间，西方的影响曾达顶峰，而结果却是中国耻辱地被日本战败。立志改革的中国爱国人士，曾经向具有改革思想的或以前的传教士们请教，例如李提摩太，林乐知（Young J. Allen (1836—1907)）李佳白（Gilbert Reid (1857—1927)），傅兰雅 John Fryer, 1839 年生）及丁韪良（W. A. P. Martin (1827—1916)）等。他们正像历史学家柯文（Paul Cohen）写的“在动荡不定的时刻”，欣赏那“超出了他们最狂热梦想”的影响<sup>⑬</sup>。

构成这些影响的原因之一，是某些老传教士视野开阔了。例如李佳白于 1897 年就中国政府和外国顾问的问题，提出一些老于世故的想法，邹明德综合如下：

李佳白认为中国改革者需要向西方学习，因为中国已经进口了不少西方的机器，出版了西方的科学著作，他说有必要评估其有利和不利方面。他还强调，遴选足具资格的西方人士担任中国官员的重要性，这是李提摩太已经提过的……李佳白强调指派外国人为中国官员时，除他们的能力、威望和德行外，不应担当令中国人敏感的职位，而必须对“中国古代仁政”有充分理解，乐于坚守“中国的圣道”。他们还应有能力区别哪些是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的，哪些是不合适的<sup>⑭</sup>。

这明智的忠告马上面对一个无从解决的难题：中国政府到哪里一下子找那些具有专业资格、文化修养甚高、通晓中国语言和经

典的西方人士呢？

在 1899—1900 年义和团之乱期间及以后，西方传教士的影响骤衰。柯文指出的两点有助于了解这一变化。首先是政治分裂事件出现，老一辈的改革者反对激进派和革命分子，导致大多数传教士及其他人黯然离去。其次，更具决定性的是：“要获得中国以外世界的讯息，还有可供选择的途径（也是大多数中国人较易接受的途径）”突然出现<sup>⑮</sup>。

本书验证了“可供选择途径”的开通和它的惊人后果。必须强调的是那些“可供选择的途径”走得更远，绝非只向中国提供“讯息”，随着讯息而来的，就是方针、具体实施和协助训练。最好的“选择途径”，十居其九是日本来的。它们以个人服务方式，显示其兼具专长与文化素养，完全符合李佳白的要求。的确，除了日本人之外，还有谁符合李佳白提出的标准呢？李佳白的忠告，不妨读作“非日本人毋庸问津”。中国官员们对此是充分认识的，在 1901—1911 年间，雇用了数以百计的日本人，而大量的西方人却离开了中国新政改革。

雇用了日本人，西方人的恐惧便接踵而来，担心日本人取代了白种人和他们的思想在中国的优势，甚而想象出黄种人联合起来反对白种人的幻象。不要忘记，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是这样的年代，总过分担心白种和有色人种大规模的种族斗争迫在眉睫。“黄祸”之说在德国盛行，日本自身早在 1898 年 1 月就宣扬种族战争的思想。高贵的近卫笃磨公爵（1863—1904），就在当时日本发行量最多、影响最大的杂志《太阳》<sup>⑯</sup>发表煽动性的文章，文章的题目就是剑拔弩张的《同人种同盟 附支那问题研究的必要》<sup>⑰</sup>。

近卫写道：“我认为，东亚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未来人种竞争的舞台。外交策略虽然可能‘一时变态’，但仅是‘一时变态’。我们注定有一场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支那人和日本人都将被白人视为盟敌。有关未来的一切计划，都必须把这一

难点铭记心中<sup>⑩</sup>。’这位日本公爵的作者信念坚定，与日本和国外联系甚广，是中日紧密合作鼓吹者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这就掀开了“黄金十年”不但履及剑及而且赋与深意<sup>⑪</sup>。

针对日本人在华取得的成就，英、美、法、德改变策略，对中国发动强大的文化外交和文化争夺。1908年11月，美国即将离任的罗斯福总统参与争夺，他宣称：“治疗‘黄祸’的药方，不管它叫什么”都必须使“中国人的教化和生活准则”依循美国的教育和基督的教义<sup>⑫</sup>。为了付诸实施，罗斯福于12月28日以行政命令宣布，将中国1100万美元的义和团事件额外赔款，指定作为教育专用<sup>⑬</sup>。他所以这样做，除了其他原因外，是1906年3月一个美国教育家向他建议，促请他运用美国教育为手段，以达致“在思想和精神上统治中国的领导者”<sup>⑭</sup>。

西方在中国利益的增长和主动进取的增强，构成了对日本在中国特殊地位的挑战。离开当时西方的进取和追求，就难于理解中国何以于1908至1909年决定在寻求先进的教育和训练方面，由依靠日本转向西方。

## 新大革命？

西方历史学家运用“革命”一词时，含义是相当广泛的。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血腥的动乱——反对英国统治的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静悄悄的”革命——农业革命、商业革命、科学及思想革命、工业革命、以至性革命和通讯革命，不那么具有戏剧性，但重要性却毫不逊色。

撇开不同的情况，怎样才能使用“革命”一词？汤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基本论点。他认为，人类思维以特殊方式构建世界，这就是典范（paradigm）。科学革命的结果是“相对新的典范全部或部分取代旧的典范”。把这论断延伸到政治

领域，库恩认为，政治革命源于“增长中的观念……现存的架构已不足以应付存在的问题……在政治和科学发展中，失灵的观念导致危机，是革命的先决条件”<sup>②</sup>。库恩甚而把各章的标题都使用“危机”、“对危机的反应”、“世界观转变的革命”革命的“无形性”及“革命的解决”等。

换句话说，革命是架构的根本变化。或则是架构中现存关系的变化（例如政治的或社会的）其过程是可以观察到的，或则是架构的转变过程已经完成，例如农业和商业。变化时间可能极长而难于察觉，例如农业革命，或者变化突然而来，但却无需暴力，例如今日的通讯革命；又或者变化既突然而又暴力的，例如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本研究的焦点是 1911 年前中国“静悄悄的革命”在 1898—1912 年，特别是 1901—1910 年间，中国在思想和体制方面，把长期形成的典范变为不同质的外来典范。中国统治阶层的精英，方向转变得如此激烈和持久，人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把它定性为革命，或者说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1901 年 1 月 29 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慈禧太后颁发了赫赫有名的新政改革上谕（全文见本书附录），发出震动朝野的指令，发动了这场转变。上谕提出：

“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sup>③</sup>

梅里贝斯·卡梅伦（Meribeth Cameron）称之为“改革运动宪章”<sup>④</sup>，雄心壮志的上谕，在精神、意图和成就上，都堪与大名鼎鼎的、简洁的 1868 年明治《五条誓文》相匹敌。后者的第五条内容，便是“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sup>⑤</sup>。订定《五条誓文》以后，便

开始明治维新时政治上的扫荡，社会及思想上的转化，明治维新其实应称为“明治转变”或“明治革命”的<sup>②</sup>。

明治《五条誓文》和晚清的改革上谕，都是寻求外国知识以加强“皇基”，绝非削弱他们既得的成就。日本现代史学者普遍把1868年的《五条誓文》作为日本向外部世界开放精神的信号，确立了延续到今天江户时代以后的进程。另一方面，中国近代史学者却忽视1901年的改革上谕，虽然它所完成的恰恰是帝制后中国所要做的事：向外部世界发出中国开放精神的信号，把中国置于帝制后的进程。它的结果是革命性的，它把中国历史的进程根本而永久地改变了。

才华出众的梁启超（1873—1929）于1898—1912年流亡日本，在14年间，撰写了当时几乎所有最重要的论著。他在1904年4月发表的《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中写道：“革命主义有广狭，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皆是也；其次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国数千年来，惟有狭义的革命。”<sup>③</sup>他探讨中国历史上的革命类型，把革命规限于武装起义反对政府的最狭义上，因而对本研究毫无补助，但他的意见仍然是恰当的。本书论及的新政革命，介乎梁论述的第一和第二种定义之间：开辟了新纪元，超出了狭隘的政治范畴，包括思想和体制根本转变的革命。

清廷从未提“新政”一词，也未对改革的目的系统地解释，其真实含义近似于“新的政治体制”，包括教育、军事、警务、监狱、法律、司法和立宪政府。新政改革的成就，远远超过了发起者的意图或想象。虽然未能达到梁启超提出的革命最广义，改造“社会一切无形有形”的因素。无论如何，它终归提供了理解新世纪中国的必不可少的基线。

## 注 释

见任达著《被忘却的“黄金十年”》(Douglas R. Reynolds, “A Golden Decade Forgotten”)。

据张振鹏统计：“在这(1871—1945年)期间，日本以武力反对中国(包括直接对华战争，在中国土地上与其他列强的战争，武装干涉中国，及占领中国领土)共计11次，先后共计历时36年，其中几乎18个年头是日本对中国直接进行军事侵略的。从1894年至1945年这52年内，日本在华军事行动共计10次，前后共计历时35年。换句话说，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这半个世纪期间，30多个年头是日本以武力反对中国。”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张只限于在中国土地上的军事行动，遗漏了1884年在朝鲜的冲突和1918—1922年的西伯利亚干涉，因而他列举的较我的为少。见张振鹏著《近代日中关系的特征》，载井上清及卫藤沈吉编：《中日战争与日中关系：卢沟桥事件50周年日中学术讨论会记录》第155—157页。

参阅神崎清著《日语在华北的文化势力上》载《支那》1936年8月1日号。

参阅实藤惠秀著《新日时代物语》，载实藤著《明治时期日中文化交流》第359—393页。“完全亲日年代”一语，见360页。

参阅实藤惠秀著《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第141页。

- ⑥ 潘慎文著《日本对中国的新侵略》(A. P. Parker, “A New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Chinese Recorder* 32.7:356 (July, 1901) )。
- ⑦ 见注⑥第357—358页。在我未读根津一的两篇文章前，潘慎文对东亚同文书院长远图谋的敏锐洞察力，曾使我大惑不解。根津一于1923年任东亚同文书院院长，文章早在1900年以中国文言文写成，标题是《兴学要旨》和《立教纲领》，论述日本希望在教育方面与中国合作，阐明了潘慎文所指责的日本意图。1901年为准备东亚同文书院5月26日正式开办，两文在上海重新发表，这就方便了潘慎文。两文均载入《东亚同文会史》(东京1988年)325—327页。日文译本收入《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东京，1982)第715—718页及第71页第88—89页。
- ⑧ 见任达著《战前中国的地区研究》与《训练年轻的中国通》(Douglas R. Reynolds, “Chinese Area Studies in Prewar China”; and Douglas R. Reynolds, “Training Young China Hands”)。

- ⑨ 乔治·林奇著《中国的日本化》(George Lynch, "Japanization of China", *Nineteenth Century* 54:216-224 (August 1903) )。
- ⑩ 雷里·宾茹著《中国的日本化》(Rene Piñon, "La Japonization de la Chine", *Revue des Deux Mondes* (August 1905) )。引文见王风冈著《日本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影响, 1895—1911 年》(北平, 1933 年) 第 107 页。
- ⑪ 日文译文摘自 1905 年 12 月根津一给东京东亚同文会秋季会员大会报告 载入《东亚同文会史》第 403 页。
- ⑫ 李提摩太引语见注 ⑩ 王风冈著第 106 页, 摘自《生气蓬勃的年代》(*Living Age* 248:637(1906) ) , 着重点为作者所加。
- ⑬ 保罗·柯文著《1900 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Paul A. Cohen, "Christian Missions and Their Impact to 1900",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Late Ch'ing, 1800-1900, Part 1* (Cambridge, 1978) 第 586—587 页及第 590 页。
- ⑭ 邹明德著《从传教士到改革鼓吹者: 李佳白与晚清改革运动》第 23—24 页。引用时略加删改, 并经作者同意。
- ⑮ 见注 ⑬ 第 589 页。
- ⑯ 有关《太阳》的历史, 分析该刊对中国辛亥革命及五四运动的态度, 的文章, 及 1895 年 1 月 5 日至 1928 年 2 月 1 日每期内容的综合目录, 见铃木正节著《博文馆 太阳 之研究》。
- ⑰ 见《近卫笃磨日记》第 62—63 页《同人种同盟 附支那问题研究的必要》, 该文又载于《东亚同文会史》第 180—181 页。
- ⑱ 见马里乌斯·詹森著《近卫笃磨》载入江旻音编:《在政治及文化交流中的中日文著》第 113—114 页。
- ⑲ 詹森著《近卫笃磨》是使人爱不释手的著作 可与《东亚同文会史》第 48—67 页资料丰富的有关近卫的章节并读。尽管近卫在 1904 年 42 岁时过早去世 但在 40 年代初期, 在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中, 就“谁是现代中日关系著名的日本先驱” 问题进行投票。反应强烈的调查结果是: 代表官方层次的近卫笃磨, 和代表非官方层次的岸田吟香。这充分表明了近卫公爵的重要性。卫藤沈吉著《日本人和中国革命: 岸田吟香的案例》, 引证了这次调查。卫藤这著作载入《日本社会与文化的历史丛书》第七卷《日本在世界上》(Miwa Kimitada ed. Tokyo: Kōdansha, 1974 p. 214) 。岸田